

“移隶葱岭”与唐代的西域经营

李锦绣

“移隶葱岭”四个字，见诸现藏英国国家图书馆的 Or. 8212/520 文书。这是斯坦因第三次（1913—1916 年）中亚考古所获的一件汉文文书，^①出土于吐鲁番。文书图版录文最早发表在马伯乐《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》中。^②其后，日本学者池田温在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中刊布更为准确录文。^③我国学者陈国灿对这件文书也有细致研究。^④2005 年，沙知、吴芳思全面刊布了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（非佛经部分）图版，并附有录文，是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献整理的集大成之作。本文正是根据中外学者整理成果及沙知、吴芳思书所附图版。^⑤

①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报告见奥雷尔·斯坦因著《亚洲腹地考古图记》（巫新华等译）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。

② Maspero H. , *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é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* , Vol. 1 , London , 1953 , pp. 93 - 95 , pl. XIV.

③ 池田温 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1979 年版，第 362 页。

④ 陈国灿 《唐西州诸曹符帖目年代及相关问题》，《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，第 80—89 页。

⑤ 沙知、吴芳思 《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》（非佛经部分），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年版，第 54—55 页。



Or. 8212/520 文书有关“移隶葱岭”的部分

文书录文如下:

1. 二事
2. 二课事。
3. 二坊肉钱事。
4. 二驃犯盗移隶葱岭事。
5. 二官人被讼榜示要路事。
6. 兵曹符为差输丁廿人助天山屯事。
7. 户曹符为给张玄应墓夫十人事。
8. 二曹符为卫士安思忠收领事。
9. 二符为麴识望身死事。
10. [兵曹] 符为警固事。
11. 法曹符为公主寺婢逃走事。
12. 二符为流人赵长寿捕捉事。
13. [兵] 曹符为警固事。
14. [兵曹符] 为已西烽火不绝警备事。
15. [户曹] 帖为勘寄住等户速上事。
16. [兵曹符] 为警固事。 一符为访廉苏苏事。

17. □为访王李绚事。一符为访流人韩张什事。
18. □符为张师子受勋出事。
19. □曹符为西夷僻被围警备事。
20. □符为征车坊牛分付龙申事。
21. □秃子举车坊麦事。
22. □均摊诸亲物库藏所由上事。
23. □为征北馆车坊牛事。
24. □为警固排比队伍事。
25. □警固收拾羊马事。
26. □符为访令史寇瑒事。
27. □贼事。
28. □囚使争繇事。

这件文书，池田温定名为“唐开元年代（c. 731）西州诸曹符帖目”，沙知、吴芳思定名“唐开元年间西州都督府诸曹符帖事目历”。根据英藏敦煌 S. 11459G 文书记载的“兵曹司开元十五年十二月印历”，可确定类似的“符帖目”、“事目历”文书，均可定名为“印历”^①。由于文书中的“廉苏苏”又见于大谷 3475 “开元十九年（731）正月西州印历”文书，池田温将文书年代定为开元十九年左右。陈国灿则考定该文书应为开元十六年，并探讨了文书反映的唐开元十六年前后西州乃至安西官府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上的许多重要部署和活动^②，启迪良多。本文根据陈先生论考，将文书定名为唐开元十六年西州都督府印历。

这件文书虽多有残缺，但内容极为丰富，关涉唐代西域经营史事颇多，本文不详考，只论第 4 行保留的“驢犯盜移隸葱嶺事”8 字。

某驢因犯盜罪而被“移隸葱嶺”。这里的“葱嶺”，指葱嶺守捉，即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所记载的“自疏勒西南入劍末谷、青山嶺、青嶺、不忍嶺，六百里至葱嶺守捉，故羯盤陀國，開元中置守捉，安西極邊之

^① 详见王永兴《王永兴学述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，第 216—220 页；孙继民《敦煌所出瀚海军两组文书试释》，《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214—264 页。

^② 见上引陈国灿《唐西州诸曹符帖目年代及相关问题》。

戍”^①。葱岭守捉是安西都护府的最西界，也是唐代实际控制的天山以南的最西境。

Or. 8212/520 文书第 4 行的 8 个字，是对葱岭军事设置的重要记载，也补充了葱岭守捉的设置和管理细节。也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引线。本文围绕葱岭守捉与唐代西域经营，将探讨四个问题。

一 葱岭守捉的前身

正像上引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的，葱岭守捉是在故渴盘陀国基址上建立的。关于渴盘陀国，中文史籍中记载纷纭，有喝盘陀^②、漠陁^③、漠陀^④、漠盘陀^⑤、渴槃陁^⑥、渴盘陁^⑦、渴盘陀^⑧、罗槃^⑨、呵罗槃^⑩、訶盘陁^⑪、槃陁^⑫、渴罗陁^⑬、渴罗陀^⑭、渴罗槃陁^⑮、盘盘^⑯、揭盘陁^⑰、渴馆檀^⑱、揭盘陀^⑲、渴饭檀^⑳等译写。一般认为渴盘陀 [khat - buan - dai] 是

① 《新唐书》卷四三下《地理志》，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6 年版，第 1150 页。

② 《新唐书》卷二二一上《西域传·喝盘陀传》，第 6234 页。

③ 《通典》卷一九三《边防九·西戎五》，中华书局 1988 年版，第 5273 页。

④ 《新唐书》卷二二一上《西域传·喝盘陀传》，第 6234 页。

⑤ 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五《城北》，范祥雍校注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，第 278 页。

⑥ 《魏书》卷一〇二《西域传》，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4 年版，第 2259、2280 页；卷四上《世祖纪》太延三年（437）三月癸巳条，第 88 页，卷八《世宗纪》正始四年（507）十月辛未条，第 205 页。《梁书》卷三《武帝纪下》中大同元年（546）八月甲午条，中华书局点校本，1983 年，第 91 页。《北史》卷九七《西域传》，中华书局点校本，1983 年版，第 3232 页。《通典》卷一九三《边防九·西戎五》，第 5273 页。

⑦ 《梁书》卷五四《诸夷传·渴盘陀国传》，第 814 页。《南史》卷七九《夷貊下·西域诸国传》，中华书局点校本，1983 年版，第 1985 页。

⑧ 《南史》卷七九《夷貊下·西域诸国传》，第 1984 页。

⑨ 《魏书》卷八《世宗纪》，景明三年（502）条，第 195 页。

⑩ 《魏书》卷八《世宗纪》正始四年（507）十一月己酉条，第 205 页。

⑪ 《魏书》卷八《世宗纪》景明三年（502）条，第 195 页。

⑫ 《魏书》卷八《世宗纪》延昌二年（513）八月庚戌条，第 213 页。

⑬ 《通典》卷一九三《边防九·西戎五》，第 5273 页。

⑭ 《新唐书》卷二二一上《西域传·喝盘陀传》，第 6234 页。

⑮ 《续高僧传》卷二《闍那崛多传》，中华书局 2014 年版，第 38 页。

⑯ 《梁书》卷五四《诸夷传·滑国传》，第 813 页。

⑰ 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一二《揭盘陁国》，季羨林等校注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，第 983 页。

⑱ 《新唐书》卷二二一上《西域传·喝盘陀传》，第 6234 页。

⑲ 《新唐书》卷四三下《地理志》，第 1150 页。

⑳ 慧超《往五天竺国传》，张毅笺释，中华书局 2000 年版，第 146 页。

Garband 或 Karband 的对译，即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塔什库尔干^①。本文简写为渴盘陀。

由于本文涉及内容是唐代的，这里引用一下《新唐书·西域传》对渴盘陀国的描述，其文云：

渴盘陀，或曰汉陀，曰渴馆檀，亦谓渴罗陀。由疏勒西南入剑末谷、不忍领（岭）六百里，其国也。距瓜州四千五百里。直朱俱波西，南距悬度山，北抵疏勒，西护密，西北判汗国也。治葱岭中，都城负徙多河。胜兵千人。其王本疏勒人，世相承为之。西南即头痛山也。葱岭俗号极崑山，环其国。人劲悍，貌、言如于阗。其法：杀人剽劫者死，余得赎。赋必输服饰。王坐人床。后魏太延中，始通中国。贞观九年，遣使者来朝。开元中，破平其国，置葱岭守捉。安西极边戍也。^②

《新唐书》这里记载的并不全是唐代的内容。《新唐书》的编纂原则是“文省事增”，尽力搜集较多史料，汇编在一起，因而在事增的同时，也有将不同时期、不同性质史料汇集，不加甄别的弊端。关于渴盘陀国的记载就非常典型。本文试追溯《新唐书》关于渴盘陀波记载的史料来源。

1. “或曰汉陀”。

《通典》卷一九三《边防九·西戎五》渴盘陀条云：“渴盘陀，后魏时通焉。亦名汉陁国，亦名渴罗陁国。”则“或曰汉陀”句，抄录《通典》。

2. “曰渴馆檀”。

慧超《往五天竺国传》“葱岭镇”条云：“外国人呼云渴饭檀国，汉名葱岭。”则“曰渴馆檀”抄自《往五天竺国传》，“馆”为“饭”之误。

3. “亦谓渴罗陀”。

《通典》卷一九三《边防九·西戎五》渴盘陀条云：“渴盘陀……亦名渴罗陁国。”则“亦谓渴罗陀”亦抄自《通典》。

^① 白鸟库吉《西域史上的新研究·大月氏考》，《白鸟库吉全集·西域史研究（上）》（卷六），东京：岩波书店1970年版，第97—227页。

^② 《新唐书》卷二二一上《西域传》，第6234页。

4. “由疏勒西南入剑末谷、不忍岭（岭）六百里，其国也”。

《新唐书》卷四三下《地理志》云：“自疏勒西南入剑末谷、青山岭、青岭、不忍岭，六百里至葱岭守捉，故羯盘陀国。”《新志》所记从边州入四夷道路，抄录贾耽《皇华四达记》^①。故“由疏勒西南入剑末谷、不忍岭六百里，其国也”一句，抄录《皇华四达记》，但有省略。

5. “距瓜州四千五百里”。

里程以瓜州为基准，应是裴矩《西域图记》的内容。^②则“距瓜州四千五百里”抄录隋裴矩《西域图记》。

6. “直朱俱波西，南距悬度山，北抵疏勒，西护密，西北判汗国也”。

《通典》卷一九三《边防九·西戎五》羯盘陀条云：“在朱俱波国西，西至护密国，其南至悬度山，无定界，北至疏勒国界，西北至判汗国。”则“直朱俱波西，南距悬度山，北抵疏勒，西护密，西北判汗国也”一段，抄录《通典》。

7. “治葱岭中”。

《通典》卷一九三《边防九·西戎五》羯盘陀条云：“理葱岭中。”这是《新传》“治葱岭中”的史料来源。

8. “都城负徙多河”。

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一二《羯盘陀国》云：“羯盘陀国周二千余里。国大都城基大石岭，背徙多河，周二十余里。”则“都城负徙多河”句抄自《大唐西域记》。

9. “胜兵千人。其王本疏勒人，世相承为之”。

《通典》卷一九三《边防九·西戎五》羯盘陀条云：“其王本疏勒人，累代相承，以居此国。有户二千余。”从文字看，《新传》抄录《通典》。但《通典》此段记载抄录《西域图记》^③，《新传》更可能直接抄录裴矩《西域图记》。

10. “西南即头痛山也。葱岭俗号极崑山，环其国。人劲悍，貌、言

① 《新唐书》卷五八《艺文志》：贾耽“《皇华四达记》十卷”，第1506页。

② 详见拙著《试论〈西域图记〉的行程系统》，廖肇羽、曹伏明主编《千年西域，百年新疆》，中国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59—70页。

③ 详见拙著《试论〈西域图记〉的编纂原则和主要内容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编《国学的传承与创新：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庆贺学术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1223—1233页。

如于阗。其法：杀人剽劫者死，余得赎。赋必输服饰。王坐人床。后魏太延中，始通中国”。

《通典》卷一九三《边防九·西戎五》渴盘陀条云：“又有头痛山，在国西南，向罽宾，历大头痛、小头痛之山，赤土、身热之阪。其葱岭俗号极嶷山。今按葱岭，周环其国。衣服、人貌、语音与于阗相似，其间多有异者。书与婆罗门同。国中咸事佛。人山居，劲健。杂人多而胡少。有音乐、兵器，有甲、稍、弓、刀。国法：杀人劫贼者死，余征罚。其税杂输之。服饰、婚姻同疏勒。王坐人床。死者埋殡七日为孝。太武帝太延三年朝献，于后不绝。”将《新传》与《通典》原文对照，此段更清晰体现了《新唐书》“文省”的特点。而“今按葱岭，周环其国”，本是杜佑按语，《新传》亦用“环其国”三字，直接抄录。

11. “贞观九年，遣使者来朝”。

《册府元龟》卷九七〇《外臣部·朝贡三》记载：“（贞观九年）四月，薛延陀、真腊、唱（喝）盘陀国……并遣使来朝贡方物。”^①《册府》与《新传》当皆据唐实录编写，故“贞观九年，遣使者来朝”句，抄录《太宗实录》。

12. “开元中，破平其国，置葱岭守捉。安西极边戍也”。

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略云：“六百里至葱岭守捉，故羯盘陀国，开元中置守捉，安西极边之戍。”则《新传》与《新志》一样，均抄录贾耽《皇华四达记》。

以上我们考证了《新唐书·西域传》“渴盘陀”条的史料来源。据此可知，《新传》截取《西域图记》《大唐西域记》《太宗实录》、慧超《往五天竺国传》、贾耽《皇华四达记》的记载，进行汇集、排比、抄录，构成了《新传》渴盘陀国的内容，但“文省事增”的同时，忽略了文献的系统性和年代性。而在抄录诸书时，因语言简略又匆忙成文，也有抄错者。如《新传》的“赋必输服饰”，令人不解。而《通典》原作“其税杂输之。服饰、婚姻同疏勒”。《新唐书》抄录时将赋税与服饰连抄，造成错误。我们当然不能据《新传》字面含义理解为渴盘陀国用服饰交赋税。

《新唐书·渴盘陀传》虽抄录诸书，无发明创造，也不是完全没有意

^① 《册府元龟》卷九七〇《外臣部·朝贡三》，周勋初等校订，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11229页。

义的。《新唐书·渴盘陀传》所记“距瓜州四千五百里”，就颇有价值。因为裴矩《西域图记》已经佚失，《新传》中渴盘陀国到瓜州的里程，是现存唯一记载，十分宝贵。

众所周知，《汉书·西域传》以来，正史《西域传》中的里程记载，都是根据从一国到另一国的路程叠加而成。《西域图记》也是如此。《西域图记序》列举南道路线云：“其南道从鄯善，于阗，朱俱波、喝盘陀，度葱岭，又经护密，吐火罗，挹怛，帆延，漕国，至北婆罗门，达于西海。”^① 鄯善，于阗，朱俱波、喝盘陀的里程是相互关联的。根据《隋书·西域传》记载，鄯善至瓜州1300里，于阗至鄯善里数1500里，则于阗至瓜州2800里。于阗至朱俱波1000里，则朱俱波去瓜州3800里。^② 喝盘陀在朱俱波西，则喝盘陀与朱俱波之间的距离是700（4500—3800）里。关于朱俱波、渴盘陀的今址，学界仍有争论，而朱俱波和渴盘陀之间的里程差距，也可以成为一个比勘的参照数据。《新唐书·渴盘陀传》“距瓜州四千五百里”句，成为我们判断渴盘陀和朱俱波位置的重要资料。

二 葱岭镇与葱岭守捉

开元十一至十五年去中亚巡礼的慧超，对葱岭镇有较为详细记载，今引之如下：

又从胡蜜国（瓦罕）东行十五日，过播蜜川，即至葱岭镇。此即属汉。兵马见今镇押。此即旧日王裴星国境。为王背叛，走投土蕃。然今国界无有百姓。外国人呼云渴饭檀国。汉名葱岭。^③

虽然只有寥寥数语，但这是有关葱岭镇的唯一记载。十分重要。据此可知，葱岭镇至少在开元十五年前已经存在了，这较上引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“开元中置（葱岭）守捉”是相符合的，而且确定了葱岭镇出现的下限。

^① 《隋书》卷六七《裴矩传》，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版，第1579—1580页。

^② 详见上引拙著《试论〈西域图记〉的计程系统》。

^③ 慧超《往五天竺国传》，第146页。

但慧超的记载也有一些疑团。最大的疑团是葱岭镇的位置。从“过播蜜川，即至葱岭镇”看，葱岭镇应离播蜜川很近，似应在大帕米尔（Pamir Kulun），与“自疏勒西南入剑末谷、青山岭、青岭、不忍岭，六百里至葱岭守捉”的葱岭守捉位置不符。天宝年间，高仙芝出兵征勃律，行程路线为“又十余日至疏勒，又二十余日至葱岭守捉。又行二十余日至播密川，又二十余日至特勒满川（瓦罕河），即五识匿国也。”^①可见从葱岭守捉到播蜜川有20日行程。据此看，葱岭镇与葱岭守捉似乎不在一地。

藤田丰八^②、岑仲勉^③和张毅^④都就葱岭镇的位置提出疑问。藤田丰八、张毅认为慧超所记的渴饭檀国在大帕米尔，岑仲勉认为应在喀喇噶赤，总之都在葱岭守捉之西。如何解决葱岭镇和葱岭守捉位置的矛盾问题呢？

笔者认为，可能葱岭镇和葱岭守捉的位置不同。《新唐书》卷五〇《兵志》记载“唐初，兵之戍边者，大曰军，小曰守捉、曰城、曰镇，而总之者曰道。”^⑤镇和守捉名称不同，都是比军小一级的建制，但史籍中有将守捉统称为镇的现象。因而仅从名称看，不能确定二者不是一个军事单位。但开元时期，作为“军镇”的镇，与守捉、城、镇一个级别的镇是不同的。如《新唐书》卷四〇《地理志》记载：

西州交河郡，中都督府。贞观十四年平高昌，以其地置。开元中曰金山都督府。天宝元年为郡……户万九千一十六，口四万九千四百七十六。县五。（有天山军，开元二年置。自州西南有南平、安昌两城，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，经礞石碛，二百二十里至银山碛，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吕光馆。又经盘石百里，有张三城守捉。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经新城馆，渡淡河，至焉耆镇城。）^⑥

① 《旧唐书》卷一〇四《高仙芝传》，第3203页。参见《新唐书》卷一三五《高仙芝传》，第4576页。

② 藤田丰八《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》，北平，1931年版，第83页。

③ 岑仲勉《佛游天竺记考释》，《中外史地考证（外一种）》，中华书局2004年版，第767—777页。

④ 慧超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》，第148—153页。

⑤ 《新唐书》，第1328页。

⑥ 《新唐书》，第1046—1047页。

这里，张三城守捉和焉耆镇是不同的。开元时，安西设的四镇，显然是军镇，地位高于守捉。

开元中灭渴盘陀设镇，可能是比照四镇行事，规模较大。这个镇应在渴盘陀的都城，其目的更倾向于割断大食和吐蕃的联系。但随着吐蕃对西域进攻的增强，唐放弃了葱岭镇，而在帕米尔之东，又设置了较小的葱岭守捉。从葱岭镇到葱岭守捉，有唐防线有东移的趋势。这可能和 Or. 8212/520 文书中记载的多次“警固”有关。葱岭守捉东移，更侧重于与疏勒、于阗配合，从而有效防遏吐蕃。

三 唐代经营西域的大背景

汉武帝建元二年（前139）遣张骞出使西域，为西汉王朝正式经营西域之始。其后，起亭障，营屯田、设校尉、都护，奠定了西域经营的规模，也奠定了中国西部疆域的基础。唐代平东突厥之后，更拓展至西域，设四镇，置军府，分别与突厥、吐蕃、大食在西域进行了激烈的争夺，其范围之广、规模之大，更胜于汉代。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在描述唐代全盛时期疆域时说“盖南北如汉之盛，东不及而西过之。”^①其中“西过之”，即欧阳修对汉唐西域经营疆域比较后的概括之语。

汉与唐是中国古代史上西域经营的两个最重要朝代，其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，扩展到以前的中原王朝未曾影响的区域。汉与唐经营西域经营过程，也具有一定的可比性。唐之所以在西部疆域范围超过汉代，很大程度上是在西北疆的开疆拓土，富有开拓进取的力度和气魄。

唐代倾全力经营西域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唐代实行“关中本位政策”，使唐代的西域地位与汉代不同。

陈寅恪先生指出：

李唐承袭宇文泰“关中本位政策”，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，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。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，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，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，以开拓西方边境，统治中央亚细亚，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。

^① 《新唐书》卷三七《地理志》，第960页。

唐关中乃王畿，故安西四镇为防护国家重心之要地，而小勃律所以成唐之西门也。玄宗之世，华夏、吐蕃、大食三大民族皆称盛强，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，不能不固守四镇。欲固守四镇，又不能不扼据小勃律，以制吐蕃，而断绝其与大食通援之道。当时国际之大势如此，则唐代之所以开拓西北，远征葱岭，实亦有其不容已之故，未可专咎时主之黷武开边也。^①

“关中本位政策”使唐重心在西北，保有西域，是唐之国策。因而唐倾全力经营西北，固守四镇，开拓西北。这与前朝视西域为手足、枝叶的认识截然不同，对唐而言，西域是防护国家安全重中之重，为腹心、根本，因而唐势必将西域纳入版图，开拓进取，将疆域推向更西，以确保实行“关中本位政策”的大唐帝国的长治久安。

唐代经营西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经历了曲折艰辛的历程，其间可分为六个阶段，即武德二年（619）至贞观四年（630），贞观四年平突厥后至贞观十二年（638），贞观十三年（639）至龙朔元年（661），龙朔三年（663）至神龙元年（705），神龙初至天宝十四载（755）及安史乱（755）后。^②

武德二年至贞观四年，唐刚建立不久，统一战争迫在眉睫，经营西域并不构成唐战略的主要部分。唐将对西域的招徕交付河西地方，主要通过外交手段，加强联系，保持与西域诸国往来；而对控制西域的西突厥，则许以和亲，以达到牵制东突厥的目的。这一阶段的西域经营，基本是消极的，是隋分化瓦解突厥“远交近攻”政策的延续。虽然高昌诸国来献异物，拂菻狗第一次来到中原，但唐与西域的关系并无实质性进展。这一时期可以成为唐经营西域的等待期。

贞观四年唐败颉利可汗，灭东突厥，为西域经营提供了新的机遇。东突厥的灭亡威慑西域，促使伊吾归附，唐在丝路开发中取得初步进展。唐在伊吾设置州县，百姓“同于编户”，这背后贯穿着战略规划，即绝不仅仅是为得伊吾一地，而是要建立经营西域的前沿根据地，将唐国界向西部

^① 陈寅恪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133、137页。

^② 参见拙著《试论唐代西域经营史的分期》，待刊于《内陆欧亚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。

推进。但初平颉利可汗后的国力，并不能使唐太宗全面铺开经营西域的计划。户口未复，仓廩空虚，是经营西域进程受阻的主要原因。贞观四年至十二年是唐经营西域的积极准备期。这期间唐一边休养生息，励精图治；一边利用东突厥破灭后的机会，逐步向西域推进。同时，唐扫平了经营西域的外围障碍，紧锣密鼓地筹备进军西域的计划。贞观八年（634），唐大举发兵，远征吐谷浑，九年，唐大获全胜，李靖并“至且末，穷其西境”^①，进军至西域边缘。讨平吐谷浑，为唐经营西域扫除障碍。贞观十二年九月，“败吐蕃于松州城下，斩首千余级。弄赞惧，引兵退，遣使谢罪，因复请婚，上许之”^②。唐与吐蕃和亲，解除了经营西域的后顾之忧。贞观十二年末西突厥分裂，自相攻战，为唐进军西域提供可乘之机。经过十余年的筹划和准备，唐终于开始实施全面经营西域计划了。

贞观十三年到龙朔二年，是唐全面铺开经营西域时期，也是唐代经营西域的高峰期。贞观十三年唐出兵高昌，高昌平定后，唐太宗力排众议，进一步在高昌和可汗浮图城设立了正式州县，并成立安西都护府，将中原地区的州县制度进一步从伊州向西域的纵深推进。在州县之下，还在伊、西、庭三州推行了与内地相同的乡里制度。贞观末，唐太宗经营西域达到顶峰，成为四夷尊奉的“天可汗”。其后即位的唐高宗利用平阿史那贺鲁叛乱之机，在西域各地设立羁縻府州，迎来了西域历史发展的新时代。这一时期，唐通过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，全面控制了西域，并向天山南北发展。唐对西域经营每前进一步，都是对北方边境开拓成功的结果。击败突厥、薛延陀，招慰铁勒，一方面使唐专心在西域用兵，无后顾之忧；另一方面也为唐经营西域补充兵源，大量游牧兵随唐进军西域，使唐在西域的战争取得摧枯拉朽之效。

龙朔三年至神龙元年，吐蕃参与到西域的角逐中，唐代经营西域进入了持久战时期，这是唐代西域经营的巩固期。

《通典》卷一九一《边防七·西戎总序》略云：

大唐贞观四年，以颉利破灭，（伊吾）遂举其属七城来降，因列其地为西伊州，同于编户。至武太后如意初，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

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四贞观九年五月条，中华书局1956年版，第6112页。

②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五贞观十二年八月条，第6139—6140页。

吐蕃，复龟兹、于阗、疏勒、碎叶四镇，自是诸国朝贡，侔于前代矣。神龙以后，黑衣大食强盛，渐并诸国，至于西海，分兵镇守焉。^①

对唐代前期的西域历史，杜佑截取记载了三件大事，即伊吾归附、王孝杰败吐蕃及大食扩张。其中伊吾归附是突厥颉利可汗败亡的直接结果，也体现了唐与突厥的关系。伊吾归附，是唐经营西域之始，伊吾也成为唐迈向西域的门户，贞观武功因此而确立。王孝杰败吐蕃，恢复四镇，是唐与吐蕃西域争夺中关键一战，唐因之在西域再次站稳脚跟。此后，吐蕃并未放弃对西域的争夺，直至安史之乱后最终占领了河陇。

唐代四镇的设置，历经曲折。《旧唐书·西戎传·龟兹国传》载：

先是，太宗既破龟兹，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，以郭孝恪为都护，兼统于阗、疏勒、碎叶，谓之“四镇”。高宗嗣位，不欲广地劳人，复命有司弃龟兹等四镇，移安西依旧于西州。其后吐蕃大入，焉耆已西四镇城堡，并为贼所陷。则天临朝，长寿元年，武威军总管王孝杰、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，克复龟兹、于阗等四镇，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，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。既征发内地精兵，远逾沙碛，并资遣衣粮等，甚为百姓所苦。言事者多请弃之，则天竟不许。其安西都护，则天时有田扬名，中宗时有郭元振，开元初则张孝嵩、杜暹，皆有政绩，为夷人所伏。^②

四镇置废及四镇名称，因时代及西北政治军事形势而有变化。显庆三年（658）唐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，统焉耆、于阗、疏勒四镇，至咸亨元年（670）被吐蕃攻陷。调露元年（679），唐筑碎叶城，碎叶代替焉耆成为四镇之一。长寿元年，王孝杰收复龟兹、于阗、疏勒、碎叶四镇。开元七年十姓可汗阿史那献移驻碎叶，唐四镇又演变为龟兹、于阗、疏勒、焉耆。^③唐与吐蕃争夺四镇分咸亨、上元年间（670—676）弃置，仪凤、调露间（677—679）争夺，垂拱二年（686）吐蕃拔四镇和长寿元年（692）

① 《通典》，第5198—5199页。

② 《旧唐书》卷一九八《西戎传》，第5304页。

③ 松田寿男 《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學的研究》，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，第357—391页。

唐复四镇等多个阶段。^①

神龙初至天宝十四载，是唐代经营西域的发展期。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大食在吐蕃之后，加入了对西域的争夺。大食扩张是七、八世纪欧亚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。实际上，终天宝之世，大食势力一直未达到葱岭以东，对唐并不构成致命威胁。但大食向中亚的扩张和与吐蕃的联兵，对唐代的西域形势产生重大影响。这一时期，唐经营西域的重点是隔断吐蕃与大食的联合。天宝十载（751）唐与大食直接交战。怛逻斯之战，一方面使唐势力退出葱岭以西，一方面由于一些兵士及工匠被俘，导致了造纸术的西传。但怛逻斯之战对唐在葱岭以东的政治并无影响。

安史乱后，唐西北边军撤出西域，安西、北庭都护府成为孤岛。面对吐蕃的进攻，安西、北庭孤军奋战，为唐坚守，自筹经费，苦苦支撑，至贞元十九年（803）于阗仍用唐纪年。这是唐经营西域的坚守期。

葱岭守捉出现在第四阶段，这也是唐经营西域最为艰苦卓绝的时期。葱岭守捉在唐与大食、吐蕃的西域争夺中出现，扩展了天山以南的实际控制范围，保证了丝绸之路南道的畅通。高仙芝征勃律就经过葱岭守捉，葱岭守捉的军事、国防地位于此可见。

安史乱后，葱岭守捉何时陷蕃，史籍无载。但和阗东北巴拉瓦斯特（Balaw）遗址出土“唐贞元五年（789）百姓某状”第3—4行有“比闻□疏勒行回，便□□钱五百文，讫今未还”句^②，似贞元五年疏勒、于阗之间的交通仍未阻绝，则疏勒贞元五年仍为唐守。这也为判定葱岭守捉持续存在的时间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。

四 流移人与唐西域经营

再回到开头所引文书中的“移隶葱岭”上来。某驢因为犯了盗窃罪，被从西州西移隶属葱岭。移民西北，是唐经营西域的措施之一。而被移之民主要是流移人。如大谷3472文书“唐开元十九年（731）正月西州都督府印历”第16行有“为配流人等，并诸县流移人等，帖到当日申事”

^① 王小甫《唐、吐蕃、大食政治关系史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68—88页。

^② 陈国灿《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480—482页。

句^①，记载的就是西州的流移人。不难推测，符文体现出开元中西州配流人、流移人仍广泛存在。而上引 Or. 8212/520 文书第 12 行“符为流人赵长寿捕捉事”、第 17 行“一符为访流人韩张什事”，也暗示了流人逃亡也成为西州一社会问题。

关于流移人的发遣、安置，唐代法律中有严格规定。《狱官令》卷第二十七有 9 条涉及流移人。记载如下：

13. 诸流人科断已定，及移乡人，皆不得弃放妻妾。至配所，如有妄作逗留、私还及逃亡者，随即申省。

14. 诸流人应配者，各依所配里数，无要重城镇之处，仍逐要配之，唯得就远，不得就近。

15. 诸流移人，州断讫，应申请配者，皆令专使送省司。令量配讫，还附专使报州，符至，季别一遣。（若符在季末至者，听与后季人同遣。）具录所随家口、及被符告若发遣日月，便移配处，递差防援。（其援人皆取壮者充，余应防援者，皆准此。）专使部领，送达配所。若配西州、伊州者，并送凉州都督府。江北人配岭以南者，送付桂、广二都督府。其非剑南诸州人而配南宁以南及嵩州界者，皆送付益州大都督府，取领即还。其凉州都督府等，各差专使，准式送配所。付领讫，速报元送处，并申省知。（其使人，差部内散官充，仍申省以为使劳。若无散官，兼取勋官强干者充。又无勋官，则参军事充。其使并给传乘。）若妻、子在远，又无路便，豫为追唤，使得同发。其妻、子未至间，囚身合役者，且于随近公役，仍录已役日月下配所，即于限内听折。

16. 诸递送囚者，皆令道次州县量罪轻重、强弱，遣人防援，明相付领。

17. 诸流移人在路，皆递给程粮。每请粮，停留不得过二日，其传马给不，临时处分。

18. 诸流移人至配所，付领讫，仍勘本所发遣日月及到日，准计行程。若领送使人在路稽留，不依程限，领处官司随事推断，仍以状申省。

^① 池田温 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，第 357 页。

19. 诸流移人（移人，谓本犯除名者。）至配所，六载以后听仕。（其犯反逆缘坐流，及因反逆免死配流，不在此例。）即本犯不应流而特配流者，三载以后听仕。有资荫者，各依本犯收叙法。其解见任及非除名移乡者，年限、叙法准考解例。

23. 诸流移人在路，有妇人产者，并家口给假二十日。（客女及婢，给假七日。）若身及家口遇患，或逢贼难、津济水涨不得行者，并经随近官司申牒请记，每日检行，堪进即遣。（若患者伴多不可停待者，所送使人分明付属随近州县，依法将养，待损，即遣递送。）若祖父母、父母丧者，给假十五日；家口有死者，七日。部曲、奴婢死者，一日。

61. 诸流人至配所居作者，并给官粮。（加役流准此。）若去家悬远绝饷及家人未知者，官给衣粮，家人至日，依数征纳。（其见囚绝饷者，亦准此。）^①

唐令中关于流移人配隶、递送有详细、严格规定。流移人移隶西北等，均按《狱官令》处理，保证流移人及家口递送至配所，成为配所的劳动力。

由于移隶葱岭史料少，我们以西州为例说明。^②贞观十四年（640）唐灭高昌，设置西州，之后又设庭州，西州、庭州成为唐经营西域的前沿阵地，“每岁调内地更发千人镇遏焉”^③。除派兵驻防之外，还大量徙天下犯罪之人配防西州。贞观十六年（642）正月乙丑（九日），唐“遣使安抚西州。戊辰（十二日），募戍西州者，前犯流死亡匿，听自首以应募”^④。辛未（十五日），“诏在京及诸州死罪囚徒，配西州为户；流人未达前所者，徙防西州”^⑤；“其犯流徒则充戍，各以罪轻重为年限”^⑥。贞观中，盖

① 天一阁博物馆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《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：附唐令复原研究》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645—649页。

② 刘安志《唐初西州的人口迁移》（初刊《中华文史论丛》2007年第3辑，收入其著《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》，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，第24—43页）一文，对唐初征发罪犯配西州为户与徙中原民户入西州有详细论证，请参看。

③ 《通典》卷一九一《边防七·西戎三》“车师”条，第5206页。

④ 《新唐书》卷二《太宗纪》，第40页。

⑤ 《旧唐书》卷三《太宗纪》，第54页。参见《新唐书》卷二《太宗纪》，第40页。

⑥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六贞观十六年正月辛未条，第6175页。

蕃“兄伯文任洋州洋源县令，坐事幽繫，将置严刑”，后“得减死配流高昌。此国初平，磧途险涩，距长安七千余里”^①。盖伯文即移隶西州的死罪囚徒之一例。这样，死囚犯与犯流徒者大量移隶至西州，西州的人口构成为“高昌旧民与镇兵及谪徙者杂居”^②。

流移人和镇兵构成西域汉户主体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四〇《庭州》记载庭州人口时说“开元户二千六百七十六，乡五”。而“其汉户，皆龙朔以后流移人也”^③。如果每户五人，庭州户口超过万人。这万人皆为流移人，可见流移人不但充实了庭州人口，而唐流移人至西北边境的政策也取得了实效。

初置西州时，唐以减刑、免死的方式，一度大量向西州移民。随着西州、庭州日益稳固，唐移隶西州、伊州制度，也固定下来，并写入《狱官令》条文中。正如《狱官令》第15条所示，移隶西州、伊州，成为流移人的主要去处，与岭以南、南宁以南及雋州界的移隶鼎足而三。《天圣令》中引的唐令，一般认为是开元二十五年（737）令，复原的《狱官令》第15条只提到“若配西州、伊州者”，体现了唐令编纂的滞后性，实际上，随着唐在天山南北的开疆拓土，昂然西进，移隶西北的范围不只是西州、伊州两州，而包括了西州、伊州以西的广大地区。而正由于有大量移民，从西州至葱岭，唐建立了坚固堡垒，在西域全面行使了主权。而汉户的进入，也加强了汉文化输入，促进西域对汉文化和唐国家的文化认同。而正因为随着汉文化在西域的逐渐深入，唐在西域建立四镇，直接管理塔里木盆地南缘，将驻防扩展到葱岭，也就水到渠成了。

《唐会要》卷四〇《君上慎恤》开元十二年四月敕云：

比来犯盗，先决一百，虽非死刑，大半殒毙。言念于此，良用惻然。今后抵罪人，合杖敕杖，并从宽，决杖六十，一房家口，移隶磧西。其岭南人移隶安南，江淮人移隶广府，剑南人移隶姚、雋州。其磧西、姚、雋、安南人，各依常式。^④

① 周绍良主编《唐代墓志汇编》咸亨015盖蕃墓志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519页。

②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六，贞观十六年九月癸酉条，第6177页。

③ 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1033页。

④ 《唐会要》，中华书局1955年版，第718页。

某驢移隶葱岭正与此诏令有关。犯盗罪中原人“一房家口，移隶碛西”，而碛西人“各依常式”。某驢从西州移隶葱岭，正是犯盗后免决杖一百而向西移徙的“常式”。某驢移隶葱岭文书，与开元十二年（724）敕令相距不远，正体现了开元十二年四月敕的实施。而碛西人犯盗移隶葱岭的事例，也提供了一种可能性，即葱岭镇在开元十二年似已设立。

移隶葱岭之人，主要是充当防人，加强军事力量。《贞观政要》卷九《议安边第三十六》略云：

贞观十四年，平高昌之后褚遂良上疏曰：“……陛下每岁遣千余人而远事屯戍……兼遣罪人，增其防遏。所遣之内，复有逃亡，官司捕捉，为国生事。高昌涂路，沙碛千里，冬风冰冽，夏风如焚，行人去来，遇之多死。”^①

移隶葱岭的某驢，也是为“增其防遏”的。除流移人外，葱岭守捉尚有从内地发遣的镇兵。

从中原到高昌，如褚遂良所云，“沙碛千里，冬风冰冽，夏风如焚，行人去来，遇之多死”。移隶至葱岭，某驢的路途更为艰难。《隋书·西域传》记载“高昌国者，则汉车师前王庭也，去敦煌十三日行。”^②即高昌去瓜州1300里。而渴盘陀去瓜州4500里，这样算起来，西州去葱岭守捉的里数超过3000里。实际上，某驢从西州到葱岭的行程更遥远，更艰巨。某驢移隶葱岭的路线应是先走中道，再从疏勒至葱岭，即：西州—焉耆—龟兹—疏勒—葱岭。其具体里程为：焉耆国，东去高昌九百里；龟兹国，东去焉耆九百里；疏勒国，东去龟兹一千五百里。^③从西州至疏勒，要走3300（900（西州至焉耆）+900（焉耆至龟兹）+1500（龟兹至疏勒））里。至疏勒后，某驢的行程是“自疏勒西南入剑末谷、青山岭、青岭、不忍岭，六百里至葱岭守捉”。某驢从西州至葱岭的总行程为3900里，这中间经历“冬风冰冽，夏风如焚”，更是不在话下。

^① 《贞观政要集校》，谢保成集校，中华书局2003年版，第506—508页，参见《唐会要》卷九五《高昌》，第1702—1704页。

^② 《隋书》卷八三《西域传》，第1846页。

^③ 详见上引拙著《试论〈西域图记〉的计程系统》。

从西州到葱岭，不但路途遥远，而且沙碛艰险，备尝艰辛。唐经营西域的艰辛，也于此可见一斑。而正因为唐代具有视华夷如一，不限华夷的开放思想，唐治理下的西域才空前繁荣，真正成为唐之土宇，国之藩屏，达到了唐代倾全国之力艰苦卓绝经营西域的目的。

岑参的边塞诗脍炙人口。其中一首《过碛》诗云“黄沙碛里客行迷，四望云天直下低。为言地尽天还尽，行到安西更向西。”^①“行到安西更向西”，正是葱岭守捉地位的写照。葱岭守捉的设置，也体现了唐代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。

^① 《岑参诗集编年笺注》，巴蜀书社 1995 年版，第 176 页 《全唐诗》卷二〇一，中华书局 1960 年版，第 6 册，第 2106 页。